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塔西佗集

刘小枫 ● 主编



[美]里克(James Chart Leake) ● 著

塔西佗的教诲

——与自由在罗马的衰落

Tacitus' Teaching
and the Deline of Liberty at Rome

肖涧 ● 译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塔西佗集
刘小枫 ● 主编



塔西佗的教诲
——与自由在罗马的衰落
Tacitus' Teaching
and the Deline of Liberty at Rome

[美]里克(James Chart Leake) ● 著

肖润 ●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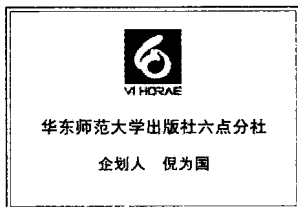
塔西佗的教诲 / (美) 里克著; 肖涧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7

(经典与解释. 西方传统)

ISBN 978-7-5617-8592-8

I. ①塔… II. ①里…②肖… III. ①古罗马—历史著作—研究 IV. ①K1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88032 号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世界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经典与解释 西方传统

塔西佗的教诲

(美) 里克 著

肖 涧 译

责任编辑 万 骏

封面设计 吴正亚

责任制作 肖梅兰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2450163 转各部门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兼传真)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

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ecnu.taobao.com>

印 刷 者 上海印刷十厂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1/32

插 页 2

印 张 7.75

字 数 17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7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17-8592-8/K · 347

定 价 29.8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HERMES

在古希腊神话中，赫耳墨斯是宙斯和迈亚的儿子，奥林波斯神们的信使，道路与边界之神，睡眠与梦想之神，死者的向导，演说者、商人、小偷、旅者和牧人的保护神……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分社 策划

古典教育基金·正则资助项目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出版说明

能与古希腊的希罗多德、修昔底德、色诺芬比肩的拉丁语纪事作家，不是撒路斯特，也非李维，而是塔西佗(Pilip Cornelius Tacitus, 约公元 55—约 117 年)，尽管今人不知道他具体生于何时、死于何时，出生地在哪里。可以确定的是，塔西佗年轻时曾学习法律，受过修辞术训练，有良好的文学修养——出任罗马帝国不列颠总督的阿古利可拉招塔西佗为女婿，古典学家据此推测，塔西佗出生于望族。

从事写作之前，塔西佗已有过丰富的政治经历，尽管今人所知甚少。塔西佗从军团官、市吏之类低级官职做起，大约三十出头时(公元 88 年)已升任司法官，这意味着他此前已做过财务官，因为在多弥提安王朝(公元 81—96 年)，晋升司法官必先经任财务官。尼禄王朝期间(公元 96—98 年)，塔西佗曾任候补执政官，据十九世纪末发现的一个铭文，塔西佗晚年还出任过罗马帝国驻亚细亚总督(公元 113—116 年)。

塔西佗说过，在多弥提安王朝写纪事会掉脑袋。可见他早就想写纪事作品，但不敢下笔。如今，我们能看到的塔西佗作品仅五种——短制三种、大书两种。讨论演说术衰落的《关于演说家的对

话》(*Dialogus de oratoribus*)是塔西佗现存最早的短制,西塞罗文风的影响很明显,与塔西佗后来的文风大为不同,十九世纪初,古典学家看到小普林尼在给塔西佗的一封信中影射过此作,才确信这一短制出自塔西佗之手。第二篇短制《论阿古利可拉的生活和品行》(*De vita et moribus Iulii Agricolae*,旧译《阿古利可拉传》)是塔西佗为岳父写的小传——阿古利可拉曾作为海军元帅统领四个罗马军团征战大不列颠。这篇短制发表的当年(公元98年),塔西佗还完成了《论日耳曼人的起源和居所》(*De origine et situ Germanorum*,旧译《日耳曼尼志》),记述日耳曼各部落的政治、经济和习俗。这两篇短制虽然采用了纪事笔法,肯定不是如今意义上的史书,更非如今所谓的人类学研究,因为塔西佗让罗马帝国的读者看到的更多是阿古利可拉这个人 and 日耳曼这个民族的道德品质,而非不列颠人或日耳曼人被征服的历史。毋宁说,塔西佗以寓意笔法告诫罗马人:罗马帝国如今表面上强盛,实际上败絮其中,因为,屡禁不衰的腐败已彻底腐蚀了帝国领导阶层的品质。可以说,塔西佗早年的三种短制主题不同、文体有别,写作用心却始终如一,他要告诉罗马人:塑造国家乃至历史的根本力量在于具有高贵品质的男子气概,如果腐败侵蚀了国家的男子气概,再好的经济繁荣景象也挽救不了帝国覆亡的结局。《关于演说家的对话》从政制变迁导致的领导阶层品质败坏问题出发来解释演说术的衰败,证明了他后来一以贯之的写作意图。

塔西佗是古典政治自由主义的思想典范之一。与现代的政治自由主义者不同,塔西佗并不相信“宪政”法力无边,他熟悉却并未呼唤雅典民主政治一类“普世观念”。塔西佗相信,要成就优良的政治,靠的不是民主政制,而是高贵精神与男子气概完美结合的优良政治才干——问题是,历史上的任何民族、任何国家遇到这样的人物实在太过偶然。与其恹惶于引进民主政体,不如以寓意笔法

记叙所见政治风云,对帝国男子施行政治哲学教育。塔西佗的两部长篇纪事作品——《晚近纪事》(旧译《历史》)和《神圣的奥古斯都驾崩以来编年纪事》(旧译《编年史》),记叙了从提比略到多弥提安时期(公元14—96年)的早期罗马帝国史,但两书都不是如今所谓史书,而是政治哲学大书。如果我们仅仅从中翻检早期罗马帝国的史料,就完全辜负了塔西佗的良苦用心。

《晚近纪事》的原文书名 *Historiarum libri qui supersunt* (英译 *The Histories*) 直译成汉语通常是《历史》,这样的书名让人误以为塔西佗写的是如今意义上的“通史”。其实,塔西佗立志记述帝国所经历的政治事件,不是出于如今所谓的“史学”目的,而是出于政治哲学的关切。塔西佗从自己亲身经历过的时代写起——也就是从公元69年(这年塔西佗大约14岁)到多弥提安遭谋杀的96年,因此, *Historiarum libri qui supersunt* 这个书名可译作《罗马帝国晚近纪事》(大约作于公元104—109年间)。写完这部分后,塔西佗再往前延伸,记叙从自己出生之前四十年的奥古斯都末年(公元14年)写到公元68年末,书名为 *Annalium ab excessu divi Augusti libri* [神圣的奥古斯都驾崩以来编年纪事],他自己简称《编年纪事》(*Annales*)——历史留下的遗憾是,直到塔西佗去世,此书都还没有杀青(最后部分大约成于公元116—117年),未及记述尼禄和图拉真王朝。塔西佗没有去找寻“史料”写罗马建国初期的共和史,而是记叙自己亲眼见到的历史或离自己的生活经历很近的历史,可见他与古希腊的纪事作家一样,目的不在于编史,而是探究政制变迁所隐含的重大政治哲学问题。现代的实证史学家们曾推测,塔西佗没有写奥古斯都时期,很可能是因为李维的作品已记叙了这个时段,后来发现,塔西佗打算完成《编年纪事》后就写奥古斯都时期,由于天不假年才没有实现——他甚至已经来不及修改《编年纪事》这部自己最成熟的作品最后几卷。

塔西佗的两部纪事大书也是罗马文学中的瑰宝,文辞精练紧凑,言简意赅,富有诗情,感染力强,政治事件的描写既生动又深刻,古典语文学家尼采也赞不绝口。除《关于演说家的对话》外,塔西佗的其余四种作品早已有了中译,译品均堪称上乘,可惜都缺乏笺释和绎读,以至于学界迄今未能珍视这份罗马文学和古典政治哲学史中的瑰宝——我国近百年来的政制变迁经历也为我们留下了一大笔政治哲学思考财富,实证史学使得这笔财富仍然还是埋藏在地下的宝藏。重新译笺塔西佗作品,选译西方学界有见识的绎读,对于我们自己学会写作晚近纪事想必不无历史意义。

古典文明研究工作坊

西方经典笺释部丁组

2011年3月

中译本说明

本书作者里克 1971 年毕业于 Williams 大学, 1974 年在耶鲁大学获哲学硕士后进波士顿大学攻读博士, 研究罗马政治思想史, 1979 年获政治学博士学位。毕业后, 里克先后在 Kenyon 大学、芝加哥大学、Assumption 大学担任助教, 继续研究罗马经典作家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政治哲学。1983 年秋, 正在研读维吉尔的里克不幸英年早逝, 古典学界中昔日的师长、同事和学生无不深感惋惜。

本书是里克的博士论文, 1981 年荣获美国政治学协会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授予的“施特劳斯”奖 (Leo Strauss Award), 随即在著名学刊 *Interpretation* 分两期连载——感谢学刊主编吉尔丁教授慨然允诺我们翻译本书。

最后, 谨将此译本献给所有关切这一问题的朋友。

刘小枫

古典文明研究工作坊

2010 年元月

中译本前言

塔西佗之于罗马,正如修昔底德之于希腊。这位当之无愧的罗马第一史家,其姓氏 *tacitus* 在拉丁文中的含义却是“沉默的”。于是,在后世绞尽脑汁希望挖掘塔西佗生平资料的学者只能遭遇塔西佗无言的“沉默”。由于无论是塔西佗本人的作品还是罗马当时的其他史料对塔西佗的生平都言之寥寥,现代学者只能从中搜寻一些蛛丝马迹或是从他的密友小普林尼的书信中推断出一些情况。

塔西佗的全名目前只能确定后面两个部分,即 *Cornelius Tacitus*,至于第一个部分是普布里乌斯(*Publius*)还是盖乌斯(*Gaius*),学界至今没有定论。他约于公元 56 或 57 年(尼禄即位初期)出生于山南高卢或纳尔波高卢,即今天的意大利北部或法国南部。他的家庭背景不详,但很可能是行省富裕的骑士家庭,与普林尼家族私交甚笃,因此塔西佗在早年就与小普林尼缔结了深厚的友谊。塔西佗年轻时曾在罗马学习修辞学,他与小普林尼可能都师从过修辞学泰斗昆体良。根据他自己的记载,他还跟随当时著名的演说家阿佩尔和塞孔都斯学习雄辩术。其文风洗练有力、端肃凝重,堪称罗马文坛翘楚,这当得益于其早年接受的严格的修辞训练。

塔西佗生活在罗马政坛风云变幻的帝制时期，一生经历了十位皇帝的统治——尼禄、内乱时期的伽尔巴、奥托、维尼乌斯；弗拉维王朝的三位皇帝（维斯帕先、提图斯、图密善）以及“五贤帝”中的前三位（涅尔瓦、图拉真与哈德良）。塔西佗最早出任公职是在维斯帕先时期，一开始担任低级官吏，后来任军团将领。公元 77 年，塔西佗与罗马显贵、执政官阿古里克拉之女成婚。至此之后塔西佗的仕途畅达，他于公元 81 年担任某个行省的财政官（quaestor），公元 88 年又擢升至行政官（praetor）。但这时罗马政权已被僭主式的人物图密善独揽，塔西佗只能在他实施的血腥暴政下痛苦而“沉默”地生活。公元 96 年，五贤帝之一的涅尔瓦即位之后，罗马的政治面貌焕然一新。塔西佗也在随后的一年出任执政官，达到其政治生涯的巅峰。大约十四、五年之后，塔西佗出任亚细亚行省的总督。晚年塔西佗将主要精力放在对自己最重要的作品《编年史》的修改上。《编年史》发表于公元 116—117 年期间，塔西佗可能在这个时期辞世，约哈德良皇帝在位的初年。

罗马帝制之下万马齐喑的社会现实以及频繁的政权更迭造成的血腥杀戮迫使塔西佗追寻古老的政治美德——审慎。尽管他在演说术方面的造诣极高（他在任执政官时期曾为罗马著名的将军鲁福斯作了葬礼演说，小普林尼盛赞鲁福斯的伟大必须配以塔西佗的演说才能相得益彰），他却没有选择成为像西塞罗那样的在公众面前直抒己见的演说家。塔西佗时代的罗马政治已经积重难返，一系列僭主式的统治者乖张暴戾、嗜杀成性；徒有其名的元老院完全丧失独立精神，成为向主子摇尾乞怜的奴隶。由此而来的是政治对人性毁灭性的影响，虔诚、忠诚、正直成了愚蠢的代名词，为了在这个昏乱的世界里平步青云或是苟延残喘，卑躬屈节、拍马溜须、出卖亲友成了最正常不过的事情。这是一个敌视任何美德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歪曲悖谬”的时代，高尚的政治人物的任何现实政治活动都会

受到阻碍。为了恢复人类对美德的记忆,为了再次向罗马人提供“政治优秀”(political excellence)的教育——在不能通过参与公众事务获得这种教育的时代,政治人物塔西佗开始撰写历史。在极端恐惧言论和文字的僭主统治之下,历史是相对安全的写作方式。诚如本书作者所言,十七世纪的《编年史》注疏者 Traiano Boccalini 已经敏锐地察觉到塔西佗的意图:

他声称对塔西佗而言,历史实际上是一种伪装,用以在敌视美德的时代通行无阻地传达一种关于政治和人性的学说……历史不过是某部作品的表面,倘若我们仔细研读这部作品,我们就会洞见最深刻的政治和道德问题。

塔西佗传世的作品共五部。其中最早的一部可能是《关于演说家的对话》,这部作品探讨演说术在帝制罗马衰落的原因,由于采用的是雄辩滔滔的西塞罗体,与塔西佗其他作品的风格有很大不同,因此不少学者认为它是伪作。直到后来发现小普林尼的一封信中提到过此文,才证实它确乎出于塔西佗之手。塔西佗在公元 98 年涅尔瓦当政时期发表了两部作品——《阿古利可拉传》和《日尔曼尼亚志》。《阿古利可拉传》为后世树立了在僭主统治之下的高尚人格的光辉榜样——阿古利可拉在不列颠的文治武功以及后来在图密善统治之下如何智慧审慎地与之斡旋。《日尔曼尼亚志》可能是塔西佗早年宦游行省时对自己感兴趣的刚健质朴的日尔曼人的政治生活、社会风习的记录。它是最早一部全面记载日尔曼人的文献,是研究日尔曼历史、尤其是德国古代史不可或缺的珍贵资源。

《阿古利可拉传》和《日尔曼尼亚志》可以说是塔西佗的试笔之作。在他的写作风格日臻成熟的晚年,在政治范围较为宽松的涅

尔瓦和图拉真时期,侥幸在图密善血腥统治之下九死一生的塔西佗开始反思纠结于心的重要问题:罗马优良的共和政体为何最终转变为僭政?在他最伟大的两部历史作品——《历史》和《编年史》中,塔西佗试图探索这个问题。这两部作品合起来共三十卷,恰好是一部完整的公元一世纪的罗马帝国史。《历史》约成书于公元109年,记叙了从公元69年迦尔巴当权至公元96年图密善之死的罗马三十年间的历史。塔西佗想在其中探讨以图密善为代表的弗拉维王朝的僭政统治是如何形成的?在尼禄自杀之后罗马并没有按照人们的希望乘机恢复共和制,反而陷入一系列内乱之中,最后弗拉维王朝的几位皇帝再次重复了类似尤利安—克劳迪乌斯王朝的僭政统治。由此可见导致罗马政体败坏的根本子不在尼禄,而必须再往前推。因此在《编年史》中,塔西佗追溯了自尼禄始、中间经过尤利安—克劳迪乌斯王朝的其他几位皇帝、上迄帝制创始人奥古斯都的罗马历史。读者可以在塔西佗含蓄内敛、不动声色的描述中感受他对罗马由共和沦为僭政的原因的全面分析。

与修昔底德一样,塔西佗并不是单纯地记录历史,而是借历史表达自己对政治、对人性以及对永恒的看法。因此西方的塔西佗研究者在历史、文学的角度之外,特别关注塔西佗作品的政治哲学维度。这一关注在文艺复兴时期达到顶峰,培根、马基雅维利纷纷成为塔西佗的伟大学生,他们惊叹塔西佗对政治事物的敏锐洞察力,同时极度推崇塔西佗为政治人物提供的关于政治审慎的训练——审慎是为高贵的目的选择有效和恰当的手段。法国和意大利的人文主义圈子在十六世纪兴起“塔西佗主义”运动。这场运动产生了大量文献,并成为当时欧洲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塔西佗在文艺复兴时期通常被“马基雅维利化”,他与马基雅维利的政治思想却有云泥之别。塔西佗的政治以美德和高尚之人的品格为基础。正如本书作者指出的那样:

虽然在关注有美德的政治行为这一点上他归属古典政治哲学,但他又在事实上强调审慎之人必须行为高洁的残酷和不良环境,因此和这一传统分离。我们相信,这是他不带幻想地拒绝撰写乌托邦文章和选择书写历史的重要原因。但是塔西佗并没有因此放弃节制或者以道德为目标的审慎。他在强调道德遭遇的困境和危险时坚持了道德。他用一种有限的方式预期了马基雅维利与古典政治哲学的断裂。他似乎在说,马基雅维利在这方面是正确的:在历史进程中以道德为目标的政治很少实现。但这一点却加强了他致力于品德和有能力的善的决心。塔西佗认为教育个人是对好人很少施行统治这一政治问题的最深刻的回应,在这一点上他赞同的不是马基雅维利而是柏拉图。

本书作者声称自己是“塔西佗主义”在当代唯一幸存的继承人,笔者认为他当之无愧。正如著名古代史家 Momigliano 所言:现代的塔西佗研究,“模糊了塔西佗的面目,并打上了二十世纪历史学家的烙印”,他们只“科学”地关心塔西佗的史料从何而来、是否真实,无视塔西佗本人的意图,从而认为塔西佗没有“客观公允”地陈述史实或是“污蔑了早期帝王的品格”。接续自文艺复兴以来的“塔西佗主义”传统,本书作者坚信,塔西佗的禀赋高过他笔下的政治人物的禀赋。由于“用高人的眼光去理解矮人比用矮人的眼光理解高人更为稳妥。因为采取后一种做法必然会歪曲高人;而前一种做法则赋予矮人自由完整展示其所是”,本书作者希望借助塔西佗提供的对历史人物的行为和思想的反思与阐释来理解他们。纵观全书,作者并不纠结于枝节问题,而是注重对塔西佗整体构思及教化意图的把握——这正是“客观中立”的现代史学研究有所欠缺之处。

在本书中，作者重点分析了塔西佗的两部作品《编年史》与《关于演说家的对话》。《编年史》在西方史学界的地位自然毋庸置疑，作者的讨论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部分——提贝里乌斯时期与尼禄统治时期。前一部分主要考察僭政在罗马帝国形成的原因以及僭主的特征和性情，后一部分探讨极少数优秀的政治人物在僭政之下应如何作为。《关于演说家的对话》长期被塔西佗研究者所忽略，甚至因为与塔西佗其他作品中的史家风格相去甚远而被认为是伪作。本书作者却认识到这本风格独特的小书的重要性——它是塔西佗的《申辩篇》！为自己倾注毕生心力的事业所做的有力辩护！

在《编年史》中，塔西佗一直以政治人物教师的身份出现。他教诲那些不幸生活在僭政之下的有德之人，要“有尊严地接受永恒的恶，同时培养审慎的性情，知道改善（倘若可能）的时期何时来临，并悄然为之努力”。但是，罗马帝国最优秀的政治人物塞涅卡、特拉塞亚等人的悲剧性结局不禁让读者掩卷沉思——在看不到希望的黑暗政治大环境下，政治行为是否总是高贵，并由于其自身的原因值得选择？在《关于演说家的对话》中，政治人物塔西佗上升为哲人，探讨何为最好的生活方式问题。借演说家阿佩尔与诗人马特努斯的辩论，塔西佗向我们展示了两种生活方式——以演说家为代表的面向公众的政治生活和以诗人为代表的退隐到自身的沉思生活。

阿佩尔之流的演说家的政治生活是一种低级的或世俗的政治生活。他们的荣誉完全来自民众和掌权者（而不是最优秀的人）对自己的认可，他们的生活需要凭靠他人、他物，不可能达到完全的“自足”，因此也不可能真正幸福。而真正的诗人/哲人，却能凭借体验与追问，在对永恒之物——诸神与自然的凝神关照中，超脱必然不完美的纯粹的人事，超越人之为人的限度——必朽。《对话》中的塔西佗以作为旁观者的非常低调的姿态，讲述了或许是他生命最

重要的事件：“他介绍了卓越超群之人的品位以及自己开始对这类人的宽广视野有所认识。在这样的视野之下，政治人物更为流俗的追求虽然值得羡慕，却变得有些苍白”。

但是，正如本书作者所言，塔西佗“对终极宇宙问题的关注从不曾简单地取代他对人间问题的关注，也不曾取代他引领人走向高贵的教诲——拥抱政治同时又能对它最终的根基保持开放”。因此，早年研习演说术的塔西佗在诗人马特努斯的影响下放弃了普通政治人物作为进身之阶的演说术，转而以更整全的视角、更超迈的姿态进入政治——写作关注人类个体灵魂和整体命运的、具有永恒价值的历史。

译者

2009年11月于中山大学